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for Establishment of Professional Doctor Degree as Interpretation

Li Chao

Jilin Provincial Research Base for Cultivating Practical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Talents, Graduate School of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P. R. China

Email address:

brown321010@163.com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Chao.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for Establishment of Professional Doctor Degree as Interpretation. *Science Innovation*. Vol. 10, No. 3, 2022, pp. 69-74. doi: 10.11648/j.si.20221003.13

Received: May 8, 2022; **Accepted:** May 31, 2022; **Published:** June 1, 2022

Abstract: Since the entry of the new century, the state competent authorities concerned have promulgated a series of decrees, polici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fessional degrees fo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from macro design and overall planning.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professional degree for doctor seems to be coming out in the near future.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namely academic, and the professional degrees for doctor, the paper makes prominent the professional talents for interpreting as its characteristics by interpretation through its practice-orientation. Suggestions have been made to make sure that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the senior or high-class interpreters will be reached by establishing a set of complete, unique, forceful educational system based on the practice-orientation. Therefore, such steps for shaping high-class interpreters as target, enrollment or admission qualification, curriculum setting, teacher allotment, teaching mode, dissertation defence and quality evaluation would be discussed and reflected here in detai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cipline based on the theory. The suggestions and methods put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 would be greatly meaningful and helpfu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TI programme and its education to come in the future in China.

Keywords: Interpreting Doctor, Professional Degree, Practice-Oriented, Social Needs

翻译博士专业学位（DTI）发展路径研究

李朝

吉林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吉林省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研究基地，长春，中国

邮箱

brown321010@163.com

摘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主管部门宏观设计、总体规划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培养专业博士文件与政策，在此背景下，翻译专业博士培养呼之欲出。为了厘清翻译专业博士与传统翻译学术博士的差异，文章以翻译专业博士口译方向为指向，突显专业博士人才培养的特殊性，为确保培养目标的实现，建立一套完整的、独特的、强有力的并以实践为基础的培养体系，侧重从目标定位、入学资格、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模式、毕业论文、质量评价等教学环节方面思考，进行了学理性阐述，提出了相关建议与策略，对未来国内开办DTI教育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 翻译博士，专业学位，实践指向，社会需求

1. 背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由国家主管部门宏观设计、总体规划,国家从宏观层面数次出台了与专业学位有关的发展计划与规定,积极促进与发展专业学位教育。2002年初,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专业学位,或称职业学位,是相对于学术性学位而言的学位类型,培养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的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专业学位与相应的学术性学位处于同一层次,培养规格各有侧重。”[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7年1月在第23次会议上通过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这是探索、建立中国特色专业学位教育制度的又一重要举措。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2010年召开的第27次会议上审议并下发了《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和《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设置与授权审核办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于2020年9月发布的《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2020-2025)》提出了今后加快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的要求。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21年12月10日印发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将“翻译(0551)”设为一级学科,在附件1第一页下底部脚注印着“注:代码第三位为‘5’的是专业学位类别,专业后不加‘*’的可授硕士、博士专业学位,专业后加‘*’的仅可授硕士专业学位”字样,其中“0551翻译”(不带*)与文学类下的中国语言文学(0501)和外国语言文学(0502)并列。

自开办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到目前已经16年,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翻译人才,做出了相应的贡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已经积累一定经验,翻译博士专业学位设置亟待跟进,以培养翻译职业领域的高端人才。”[2]而社会发展的“新挑战对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完善与建构提出了新要求,探索建设更为成熟、更高质量的体系2.0是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进程中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重大问题。”[3]

不论国内还是国外,专业博士学位产生的原因主要是“①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许多职业不断提高对从业人员的要求,有些职业甚至将获得更高学位作为从业的基本资格,②传统学术博士只关注纯学术,为知识而知识,为研究而研究,忽视专业领域的应用性研究,出于解决专业实践问题的需要,专业博士研究生应运而生。③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在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截然分开的,知识生产在先,知识应用在后,知识是先开发后应用。”[4]简言之,它是为了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要而产生的。

但目前从专业学位上看,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体现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不高,培养模式与学术型研究生的区分度不明显,是不争的事实。选拔标准、课程设置、导师构成、实习毕业要求等方面的雷同,导致社会对学硕专硕同质化培养的质疑声不断。专业博士的培养规模目前虽然偏小,但同样存在模仿学术学位培养

方案、质量把关不严、实践性特色不明显等缺点。”[1]虽然上述这些问题是专业学位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但如何在未来的翻译专业博士教育发展上避免重蹈覆辙,则是本篇文章所要关注与探讨的核心问题。

文章从培养高级翻译人才角度,“为了与MTI有所区分,笔者用‘高端’而非‘高层次’来定位DTI人才。”[5]阐述未来翻译高端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以口译实践培养为指向提出了从人才录取、课程教学、师资配备到最后毕业成果认定等一系列关键环节,凸显实践型高端人才培养的特殊性,提出了一些构思、对策、建议,对国内未来设立翻译博士专业学位(DTI)教育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2. 对翻译博士专业学位(口译方向)教育思考

2013年我国倡导了“一带一路”战略,至今也已经9年,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体现“国家意识”,作为翻译的语言服务必须铺路。面对新时代、新文科、新发展、新挑战,翻译学科已经从边缘走向中心。翻译问题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两种文字转换的微观问题,它已经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问题,无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是“一带一路”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各个层次语言服务人员,翻译学科在这种大背景、大环境下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层次、质量与数量决定着未来事业发展及国家战略的进程与走向。国家战略的实施需要更多、更高级的翻译人才,这就为高等教育设置DTI(Doct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翻译博士专业学位)课程提供了可能与发展机遇,因为翻译“专业学位不仅在学科上需要拓宽,在等级上也需要延伸,这都要求大力发展专业博士学位。”[6]

开办翻译博士专业学位是新生事物,对该学位的设置方案很多业界人士还处于朦胧状态,尤其对培养目标、招生对象、教学课程设置、导师资格与标准、培养过程与模式、学位论文、评价标准等一系列环节要求还需要厘清,本文将就上述问题以口译培养方向进行探讨、分析、研究。

2.1. 培养目标

口译实践一般要求译者现场进行,但最近几年因疫情原因而受到较大限制,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给口译活动带来巨大的机遇和变化,使得现场口译借助AI发生了场地变化,近距离的口译活动变成了跨越时空在云端进行的远程口译、视频口译等在线口译,“远程口译使得口译活动本身虚拟‘在场’。”[7]由此使得诸如远程口译、机器口译、人机交互等非现场的新兴口译形式变得更加普及与常态化,这就会导致口译实践及口译形态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会带来学生译者积极广泛参与度、降低心理压力、对非语言符号(即对非语言模态,如视觉、听觉、触觉、面部表情、神态、情绪、身体姿势及运动模态等肢体语言)有利,能够提升学生译者能力发挥等,但同时可能也会因网络不畅或效果不好而造成他们口译实习质量不够理想等,这些口译模态的改变也会对口译教育产生深远影响,因为“从符际翻译视角看待口译与口译教育,有

助于厘清口译与笔译之间的边界,也有助于厘清口译教育改革的方向与路径。”[7]高等教育机构面对口译发生的新形式、新变化、新挑战,如何调整现有的教育模式和教学课程,尤其是培养高级口译人才的机构,应对新业态,丰富口译理论,完善口译实践,实现学校培养口译人才与社会需求口译人才无缝对接,以达到高校培养合格、适应性强、职业化的DTI口译人才,所有这些都摆在了教育者与管理者面前。那么,针对口译领域发生的新变化,高校培养的高级翻译口译人才应该是什么样的高端或领军人才呢?

国内有专家提出在专业博士人才培养与学术博士人才培养方面,可以用“研究型专业人员”与“专业型研究人员”加以区分。“‘研究型专业人员’,即具有行动研究和实践反思能力的专家型专业工作者。他们不仅要具有很强的专业工作能力,能解决专业领域中的复杂、疑难问题,还要具有很强的专业研究能力,担负起生产专业知识的重任,要对专业实践知识发展作出独创性贡献。在这一点上,专业博士研究生教育与学术博士研究生教育有根本的区别,学术博士研究生教育偏重学术研究能力,常以理论为导向,其旨趣在于为高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具有从事原创性学术研究能力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学术性’是它的主要价值取向,其目标是培养‘专业型研究人员’。‘研究型专业人员’与‘专业型研究人员’从字面上看只是位序不同,但却蕴含着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4]很明显,培养的高端口译人才应该具备专业研究能力与专业工作能力,两者达到双强的程度,因此,成熟的、高端口译者的素质:熟练的口译技能与学者的研究能力合二为一。

2.2. 招生对象

申请者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方可报名,这是一个似乎不需要说明的问题,但实则不然。翻译博士专业学位中的口译方向培养的是高端口译人才,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即具有一定年限工作经验,他们处于职业发展的上升期,“DTI招收对象以语言服务相关行业从业者(含译者/员、翻译审校人员、翻译管理人员、翻译技术研发人员及高校翻译教师)为主。”[8]因此,定位明确后,培养单位选拔时应该有一个基本标准,入学新生的条件应该严格把控,对入学人员的要求与一些普通专业的入门槛不同。从职业化要求的角度出发,应该要求申请者在进入翻译专业博士前最低具备CATTI口译二级水平或以上证书,CATTI是中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hina Accreditation Test o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是业内公认的专业水平考试,获得口译二级或以上资格证书表明申请者的专业技术能力,同时还要具有一定工作年限(3-5年)和参加过一定口译场次(譬如100场)或小时(譬如150小时)的实际口译工作及其证明材料。之所以有上述要求是因为它“和传统的哲学博士教育相比,专业博士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特定职业的需求,专业博士教育从一开始就和职业紧密联系,而在未来,这种联系会更加紧密。专业博士教育在招生环节要更多地考虑申请人的职业背景和经历”。[9]为了保证高质量、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一定要设一个入门槛,这样才能保障与匹配未来人才的质量,也就是说,通

过在校3年左右时间的专业博士阶段学习后,申请者应该能够达到口译技能与口译研究能力双强,其专业技能水平提升一个级别,使其毕业前具备CATTI口译一级资格证并能够利用所学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解决口译中出现的重大或重要问题的能力,这样毕业生才能成为职场上真正的佼佼者,初步具备副译审的条件或资质。

2.3. 教学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方面,“专业学位博士生的教学可分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部分,”[10]口译方向培养可根据专业方向培养目标设为核心课程模块、研究方法课程模块、选修课程模块等,鼓励他们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与口译实践,可将其纳入前沿问题研讨和实践课程模块中。因此,“翻译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推行模块化教学势在必行。所谓模块化教学,是指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机结合,对所有课程进行整合分类,组成理论性、实践性、行业性的模块,教学内容由学校的教师团队和企业行业的专家团队共同完成。”[11]

由于培养的具体方向不同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要有所区别,口译方向种类比较多,譬如:交传方向、同传方向、会议口译方向、法律口译方向、社区口译方向等,其生源结构、师资要求等都会有很大区别,但是它们又是保障培养单位专业博士口译教育能否有效持续发展的关键。从其在学期间口译实践场次来讲,应该要求其具备一定的参与口译实践数量。目前以跨国时空通过网络口译的机会越来越常态化,学生译者在学期间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进来,这样可以保证其与口译实践的连续性。“就职业化口译人才培养而言,要实现学校教育 with 口译职业之间的无缝对接,需要将真实口译活动引入口译课堂。这里不单指口译教师自身从事的口译现场活动素材、录音、录像等视觉、听觉或者视听资料,还包括在教学素材选择中有效补充远程口译、在线口译、线上与线下口译活动等多模态素材。”[7]可以将学生译者的线上线下口译实践纳入到实践模块里,构成实践指向的培养路径。

口译工作坊是学生的专业提高课,也是他们在校内期间的实训课,更是学生与导师进行互动探讨交流并通过翻译实践学习和提高翻译质量课。博士阶段的口译工作坊与硕士阶段的口译工作坊存在着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从形式上看是相同的,都是由两人以上参与的小组活动,按照根茨勒的定义,翻译工作坊是“类似于某种翻译中心的论坛,在该论坛上,两个或两个以上译者聚集在一起从事翻译活动”[12]参与者围绕口译领域或口译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分析、研究,最终对探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不同的一面则体现在口译内容层次与难易程度上,博士比硕士探讨的深度与广度都更进一步,人员规模可能要小一些,一对一的情景与场合一般比较多。目前新冠疫情的肆虐,很多口译工作坊移到云端进行,也包括其他一些课程进行网络授课与交流。

2.4. 导师资格与标准

对于翻译教师的要求则更加注重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师不仅在翻译理论上有一定造诣与修养,更要有

一定的翻译(笔译或口译)方面的实践经验,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提出的相关问题能够给予一定的答疑解惑。作为实践型应用人才的培养,他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并非是理论上的而是翻译实践中遇到的切实问题,因此,教师一方面站在学术的层面进行指导,另一方面还要对实际问题给予回答,经常需要教师亲力亲为或现场进行翻译实践进行有说服力的指导,没有经过翻译实践或行业工作的教师是很难胜任的实践型课程或实践性的指导。这种“教学旨在培养专业化或职业化翻译人才,而专业化或职业化翻译人才须具备两种能力,即翻译能力和译者能力。前者是指进行成功翻译所必需的知识,包括目的语语言知识、文本类型知识、源语语言知识、现实世界知识、翻译所涉及到的两种语言之间对比的知识等。后者包括能够领会源语所负载的蕴涵意义并能熟练地将这些意义再现到目的语中来、熟谙源语和目的语所代表的两种文化、具备良好的写作基本功及广博的百科知识。”[13]

虽然目前全国已有数十所高校设有外国语言文学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点,这为翻译方向培养博士奠定了数量基础,但不是说这些高校就都具备或可以招收翻译专业博士,而只能说明具备了其中一个条件,如果负责专博的领导对培养专博的意识及理念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学校缺少翻译实践型的导师,即使这样的学校招翻译专业博士的话,那么后续一系列的培养及教学问题就会出现,教学与实践的脱节问题就会凸显,出现两张皮现象不可避免,学生的翻译实践指导由于得不到有翻译实践经验的导师指导而会流于形式,其结果是学生质量就会大打折扣。专业博士师资队伍组成的关键在于“高校应升级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导师队伍,推行校内外双导师制,共同指导学生的论文、实习、就业等,形成‘双师同堂同指导’模式。”[3]

2.5. 培养过程与模式

在培养翻译专业博士过程中,因高校的短板在于缺乏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要达到培养人才的规格,必须走联合培养的路径,这已经是专家们形成的共识,“充分发挥高校与有关企业和社会部门的优势,采用联合培养为主的方式培养专业学位博士”。[14]“大学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培养专业博士”, [15]“大学要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培养专业博士生”, [4]以弥补自身培养应用型人才在师资与实践经验方面的不足。

在博士学习阶段,对于译者的翻译能力和译者能力要注重系统地培养,一个成熟的译者一定是经过千锤百炼、无数次的翻译实践积累而成的。“专业博士生不仅注重领域性知识的学习,更注重研究方法的训练,不仅要养成利用理论研究成果来解决问题的意识,还要通过深入研究专业领域内的问题,对高深的、常人难以把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成为研究型专业人员。”[4]因此,无论是笔译者还是口译者,他的思维一定要与作者(作品)思维对接起来,如果两个思维对接上,译者翻译的思路就能够正确,反之就会出现偏差,译文完全有可能就会出现与原文或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形成南辕北辙的情况。那么,译者与作者思维如何对接呢?“就是译者的思维与作者的思维要保持一

致,作者在原作里所描绘的一切,译者要凭自己已有的知识、生活经验、人生阅历等去与作者及作品里的描述内容保持同步与一致,犹如作者所思就是你自己所思,他所想就是你自己所想,尽译者最大的努力接近作者的思维,也只有在两者的思维基本或者完全对接的情况下,译者所要翻译的内容,才不至于出现方向的偏差与偏离。”[16]译者的能力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其中包括敏锐力,观察力,申辩与思维能力,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分析能力,归纳能力,判断能力,跨文化能力,动手能力(翻译,查资料,借助相关工具能力),等等。

而口译者因其受时空限制和所从事的工作特性等因素,除具备上述各种能力以外,还需具备许多独特的能力,譬如听力能力、快速转换与语言表达能力、记忆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而这些能力是笔译者所不及的或无法达到的。

2.6. 学位论文

专业博士论文是衡量一个博士生毕业是否达到培养人才规格的重要标志之一,“博士生教育本身具有一定的学术要求,包括学分、学时、学位论文撰写等,整个教育阶段不可能全部用于提高实践能力。”[2]如果学生仅通过在校学习就完成从新手到熟练译员乃至高级译员的实践训练是不现实的。从有效指导和保证专业博士论文质量角度出发,有专家认为“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至少需要2名导师组成团队联合指导专业博士生,其中既有理论深厚的学术型导师,也有来自校外具有丰富的专业工作经验的专业型导师,通过与专业实践的紧密结合,使理论、方法与经验充分融合,切实提高专业人员基于研究的专业能力,造就‘研究型专业人员’。笔者反对取消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做法。”[4]校内学术导师与校外实践导师合作指导专业博士毕业生论文撰写是有别于传统的学术型博士生论文指导的路径,通常专业博士从实践中挖掘论文选题,由三方(校方学术导师、校外实践导师、博士生本人)在一起商量后最终确定,因为“论文阶段是学生真正回归‘田野’的时候”, [17]这里提到的“田野”实际上就是指口译实践中遇到的口译实践问题,口译专业博士生要善于在实践中发现与提炼论文选题,这是确保论文是否符合专业博士培养的其中一条重要标志,对于以实践为指向进行选题的路径,专家们有共同的认知,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以应用性研究为主,学位论文选题要求紧密联系实际,能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14]学博与专博论文的区别在于“一是发现新知识,二是对已有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应用。研究型博士学位侧重于前者,而专业博士学位重于后者。”[18]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特色则是“选题应来源于专业实践领域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强调研究的实践意义,以改进专业实践和对专业实践知识发展作出贡献为目的,研究成果体现应用性和专业独创性,主要是为专业实践和专业实践者发展服务,不仅要在理论框架、方法和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等方面作出创新性贡献,还要对专业实践发展作出创新性贡献。”[4]众多专家学者对此有相同或相似的描述与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2.7. 评价标准

口译专业博士的评价标准应该体现对其学术水平和专业水平并重，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将其视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学术水平侧重指学生对于在实际口译工作中发现的疑难问题后能够以学术的理论或相关策略或具有独创性的路径与方法去解决并得到圆满结果的能力。

对此，国内部分专家辟有专门阐述，“专业独创性与学术独创性不同，主要体现在对实践性知识作出原创性贡献或对理论性知识进行创造性应用方面。对专业博士研究生教育进行评价不仅仅要注重学术水平……对专业知识生产和专业技能开发作出创新性贡献，还应当注重专业水平……对专业人员专业能力的训练和提升。……唯其如此，才能保证从整体上实现专业博士的培养目标。”[4]“评价论

文水平主要考核其综合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看其内容是否有新见解，或看其实际应用价值，是否对语言服务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或看其翻译实践水平是否能够直接从事高级译审编审的定稿工作。”[19]这说明对口译专业博士的评价尺度既重视学理方面的掌握，但更注重其用学理方面的知识去解决实践中的重大或重要问题的能力，这是保证专业博士学术论文水准的基本要求。

3. 学术博士与专业博士的培养差异

以上就专业型博士人才培养路径的几个关键方面进行了阐述，为了能够更清晰、更简明地展示翻译学术型博士（Ph.D.）与翻译专业型博士(DTI)在培养方面的差异，从下表中可窥一斑，一目了然：

表1 翻译学术型博士（Ph.D.）与翻译专业型博士(DTI)人才培养对比。

硕博与专博培养方案区分项目名称	翻译学术型博士（Ph.D.）	翻译专业型博士(DTI)
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	强调学术能力，属于研究型的人员，即学者，翻译理论家	强调职业能力，属于研究型的专业人员，即专家，翻译家
生源结构与要求	侧重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及其读博后的学术潜质，应届硕士生可直博或考博	侧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及其翻译实践能力与经验，要求具备一定的翻译实践量（笔译不少于100万字；口译不少于150小时或场次）；应届硕士生不能直博或考博
课程设置	注重理论性与学术性的课程，几乎没有实践课程	注重实践型课程，理论与实践课程并行，但只开设与翻译实践或与论文写作密切联系的理论课
导师培养方式	校内学术研究导师（组），指导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	校内与校外实践部门联合导师组，校内导师以指导学生学术研究能力为主，校外实践导师指导实际解决问题能力为主
学生能力要求	在学期间出版翻译研究专著，发表翻译研究论文（以CSSCI期刊发文为主）	口译方向要求一定量的口译实践场次或按照以小时为单位的时间数；或撰写与翻译实践相关的论文（不以CSSCI期刊发文为主）
教学方法	以理论系统探索展开教学，研究焦点在于理论上的突破或创新，即以学习小组讨论为特征	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以实际问题指向为主展开教学，以创新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最终目标，即以案例教学为特征
论文写作与答辩	强调基础研究与理论意义，注重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新贡献	强调实践意义与研究成果的应用性，注重解决翻译实践过程中的重大或重要问题

从上述表格中可以注意到高端口译人才培养过程中侧重“专业性”教学，而且在学期间体现“田野”的口译专业博士生培养模式，要求口译研究者深入到口译现场研究或过程中，参与实践并从实践中寻找问题、解决问题，以体现口译研究专业特性，提升口译专业博士的培养质量。

4. 结语

培养高端口译实践人才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会涉及诸多问题，譬如口译教学中的跨学科趋势，包含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神经心理学、脑科学等，在学生实习方面，学校不具备相应口译实践机会，也不具备在业内实际工作的导师，需要与行业单位的合作方能实现学生实践与配备实践导师等，这些问题不是仅仅由培养机构单方面能够解决的。因此，为凸显高端口译人才培养特征，达到培养人才的规格与目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突破现有传统的培养学术博士机制，在招收专业博士生源、课程设置、导师配备、教学过程、论文撰写等方面以侧重口译实践及其成果为指向；第二，建立学校与企事业单位、学校与学校间的合作培养网络，前者侧重在校企、校政层面的合作，为彼此搭建共享平台，进行项

目合作与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后者侧重为翻译学科和口译学生的学术拓展提供保障，这样既可以避免因一校在培养方面的软肋，另一方面为保障培养质量提供了基础，使翻译专业博士教育体现应用性、实践性、政产教融合培养的主体特征；第三，各培养单位构建一个资源库，可以涵盖跨地域、跨学科、跨行业的口译基地单位，为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口译人才提供服务、为学科的发展提供口译数据支撑。第四，在就业方向上，培养院校可以开展类似订单式培养，学校与用人单位就培养学生的翻译实践展开合作，教学与科研密切结合。目前口译需求单位主要有大中型翻译专业公司（语言服务公司），外事部门（省市外事办），对外交流发展与友好部门，高等学校等，而高等学校由于开设有MTI和翻译本科需补充大量口译师资，因此对翻译专业博士口译教师的需求量可能要高于市场需求与预期。

致谢

本文系吉林外国语大学2019年度专项基金《我国设立DTI（翻译博士专业学位）的必要性》（项目编号：JW2019JSKY011）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关于加强和改进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EB/OL]. (2002-01-0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0201/t20020109_162658.html
- [2] 穆雷、仲伟合. 翻译博士专业学位的定位思考——从设置方案的修改论证谈起[J]. 外语界, 2017 (4): 27-34。
- [3] 光明日报 -2021-8-03 <https://m.gmw.cn/baijia/2021-08/03/35047975.html>
- [4] 袁广林. 专业博士培养目标定位: 研究型专业人员[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4 (11): 1-5。
- [5] 穆雷. 翻译博士专业学位设置的相关问题再探[J]. 英语研究, 2021 (1): 21-31。
- [6] 李云鹏、于珈懿. 我国教育博士培养的初步实践与存在问题[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8 (1): 103-107。
- [7] 王洪林. AI时代口译教学改革的进路: 从单模态到多模态再到跨模态[J].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1 (2): 76-81。
- [8] 傅琳凌、穆雷. 跨学科视域下的翻译博士专业学位(DTI)设置与发展[J]. 外国语, 2021 (2): 99-108。
- [9] 高进军、陈瑶、邵福球、李彦武. 从ICPD看专业博士教育的国际发展趋势[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2 (4): 68-71。
- [10] 罗英姿, 李雪辉. 我国专业学位博士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进策略——基于“全国专业学位博士教育质量调查”的结果[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11): 67-78。
- [11] 吕红艳. 新时代背景下设置翻译博士专业学位的构想[J]. 上海翻译, 2020 (6): 56-60。
- [12]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7.
- [13] 李明、仲伟合. 翻译工作坊教学探微[J]. 中国翻译, 2010, (4): 32-36。
- [14] 邓光平. 国外专业博士学位的历史发展及启示[J]. 比较教育研究, 2004 (10): 27-31。
- [15] 周富强. 美、澳、英专业博士教育模式浅论[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6 (6): 68-73。
- [16] 李朝. 翻译概论[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20: 138。
- [17] 胡纵宇. 教育博士的培养指向: 专业性向度与实践性向度[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4 (11): 5-9。
- [18] 李云鹏. 哈佛大学“教育领导博士”学位的创设及启示[J]. 比较教育研究, 2011 (5): 41-45。
- [19] 穆雷、仲伟合、王巍巍. 从职业化角度看专业翻译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J]. 中国外语, 2013 (1): 89-95。